

Dostoevsky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全集

17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

第十七卷

文论（上）

陈 燕 主编

白春仁 刘文飞（按姓氏笔画顺序） 副主编

白春仁 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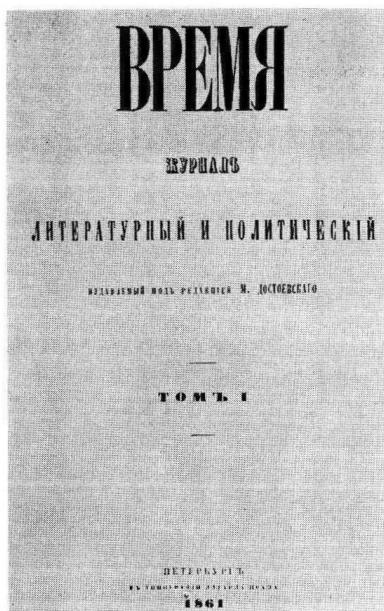
陀思妥耶夫斯基 1861



阿·尼·格里戈里耶夫
19世纪50年代



尼·尼·斯特拉霍夫
19世纪50年代



《时代》1861年第1期扉页





作家 1861—1863 年的住处
(《时代》和《时事》编辑部所在地 彼得堡)

译序

《文论》卷收入了作者报刊时评和文学论文的主要部分，写于 19 世纪 40 年代与 60 年代，记录下这一时期内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文论和时评家的创作历程。在小说虚构的艺术世界之外，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充满矛盾、追求、变化的俄国文坛，乃至社会，其中的主人公便是陀思妥耶夫斯基。

陀思妥耶夫斯基自称是眷恋时事到着迷程度的作家。他认为，文学家不只是关注生活中已经积淀成型的人物和情况，也有权捕捉处于形成变化中的人物和情况。步入文坛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贯始终地关心时局和时事，关心社会生活和社会思潮的走向。他不仅如饥似渴地吸收和思考社会信息，以此作为文学创作的素材，更直接参与社会生活，撰写时评文章，从 19 世纪 40 年代中期的报章讽刺小品，到 60 年代上半期的在他与兄长创办的《时代》与《时世》杂志上发表的报刊政论与文论，再到 70 年代的《作家日记》（见本集第 17—18 卷），忧世忧民之心跃然纸上。这构成了一位现实主义大师的精神魅力的鲜明标志。

最早表现青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社会激情和论辩才华的，是 1847 年创作的《彼得堡纪事》。1849 年因彼得拉舍夫斯基案件

被捕判刑，他在狱中写的说明和供词（收在本卷的附录中），不仅是他早年参加革命活动的实录，也是他进步思想的出色的申述。例如，对尼古拉时代书刊检查制度的评论，对 1848 年欧洲革命的分析，对 19 世纪 40 年代空想社会主义的批评等等，据理力争，言之凿凿，令人难以置辩。

流放服役期间，他渴望重回文坛，梦寐以求，在 19 世纪 50 年代中期甚至献诗皇上，希图获准发表作品。1859 年刑满返回阔别十载的彼得堡，立即与兄长米哈伊尔创办大型杂志《时代》，在连续刊出自己的小说新作的同时，以旺盛的精力投入政论写作。《时代》月刊自 1861 年 1 月出版，很快得到普及，当年订户即达两千多，次年激增至四千。1863 年 4 月号出刊后，因其中尼·尼·斯特拉霍夫一篇涉及波兰事件的文章，触怒了当局，被迫停刊。由于多方努力，八个月后，杂志出版人米哈伊尔获准出版一份新的月刊，刊名为《时世》，实际上就是《时代》的继续。新杂志于 1864 年 1 月创刊，出到 1865 年第 2 期即因订数锐减而负债累累，不得不破产停办。

1862 年到 1865 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创作的旺盛期，每有新作都发表在《时代》和《时世》杂志上。这期间，他的个人生活多遭变故。他的妻子涅恰耶娃病故，他与阿·普·苏斯洛娃发生恋情复又破裂，兄长米哈伊尔于 1864 年 7 月病逝。在这之后，他不得不担起办刊的全部责任，又要照顾兄长家小的生计。尤其是米哈伊尔遗留的巨额债务，给了他沉重的负担。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笔耕不辍。在这一时期内，他的思想立场是中立的。他一方面与米·卡特科夫、斯拉夫派论争，另一方面与革命民主派进行论战；也正是在论战中，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社会思想——根基论。他主张为改善农民的社会处境必须消除阶层的壁垒，赋予民众发挥力

量的自由空间，提倡村社式的生活，强调俄国民众能够捍卫自己世代的社会结构，承认社会的分裂标志着人民向往真理和对现实的不满。而所有这些证明俄国民众有能力参与政治生活。凡此种种，表现出作家的民主倾向。但与此同时，他越来越赞同用和平的渐进的方法改造现实，幻想以道德感化作为改造社会与个人的唯一可行的途径，奉东正教教义为道德的理想和规范。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种思想复杂性和矛盾性，在当时他的文论时评中得到了展示。

收在《文论》卷里的作品，主要是《时代》和《时世》两个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它们集中地反映了当时（1861—1865）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社会立场和文学观念。

在这之前，他的思想经历了一次重大的转折。早自第一部小说《穷人》（1846年）起，他便继承普希金和果戈理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真实地表现了民众的疾苦和心声。《穷人》深受别林斯基的赞赏，他也因此一度与别林斯基接近。但与果戈理不同，他不仅表现下层人民的贫困生活，而且还展示他们的精神世界。不久，他与别林斯基在艺术观上产生分歧，终于离开了别林斯基的圈子，转而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他渐渐赞同用革命的手段改变不公平的现实，而且他在小组的一次“星期五”聚会上当众宣读别林斯基致果戈理的信。这是一份激烈反农奴制的地下传抄的违禁文件，因此在彼得拉舍夫斯基案发后，他也遭到逮捕并被判处死刑，——虽然这是一次假死刑，此后改为流放服苦役和当列兵。在这一连串痛苦遭遇中，他的社会思想发生了一次根本的转变，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背叛”了“原来的信仰”。这一转变的主要内容，就是由赞成激进的社会变革转向主张和平的渐进，由反对专制制度转到寄望

于开明君主。新皇亚历山大二世于 1861 年进行的自上而下的农奴制改革，恰好坚定了他的这一信念。而这基本的立场又决定了他与革命民主派不可避免地产生意见分歧。此后，他接近弗·彼·梅谢尔斯基公爵（并担任他的刊物《公民周刊》的主编），接近东正教总监康·彼·波别达诺斯采夫，他向皇储呈献自己的作品《群魔》，以及他在《作家日记》中谈沙皇与俄国人民亲如父子等等，从而在社会思想史和文学史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屡屡被人诟病，根源就在这里。苏联的官方史学，甚至长期加给他思想反动、立场反动的罪名。然而，如果采取历史主义的态度，如果全面看待一位作家的建树，看到他创作中表现的人道主义思想，反对社会压迫、同情穷苦人民的思想，同时也看到他终生受到沙皇政府的秘密监视等处境，我们应当摆脱过去知人论事那种简单化政治化的流弊。不能不承认，陀思妥耶夫斯基虽有其弱点和不足，但在他所处的历史环境中终究不失为思想、特别是在艺术上，是天分极高而出类拔萃者。他洞察俄国社会的种种矛盾和积弊，他尤其深悉形形色色人物的心灵。他热爱人民，珍惜民族传统，以赤子之心期盼民众的自由幸福，期盼知识界与民众的团结。即便在他改变政治激进立场之后，即便在 19 世纪 60—70 年代反动统治趋于强化之时，他在作品中对统治阶级思想生活的批判，对人民历史作用的信心，并没有减弱。在公民激情的驱使下，他思索，争论，辛勤笔耕，不遗余力，时而也出现失误，不尽公允，却始终是一位伟大的作家、卓越的文论家、批评家、时评家。

《时代》杂志创办伊始，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编辑部同事尼·尼·斯特拉霍夫、阿波隆·格里戈里耶夫便卷入当时文坛上不同派别之间的论战。一方面他们与自由主义者展开了争论，另一

方面同情革命民主派的刊物《现代人》。但后来逐渐转而与民主派发生了争执，到《时世》时期甚至愈演愈烈。《时代》的征订启事申明办刊的宗旨和立场，标志着“根基主义”、或“根基派”的思想的开始形成。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 1861 年的农奴制改革为俄国的历史进程开启了新阶段，而后的基本任务就是使脱离人民的上层阶级同人民这个根基重新团结起来。而以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的革命民主派，则主张发动农民进行反对地主和专制制度的革命斗争。也就在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在俄国发展方向的问题上分裂为两派：西方派主张西欧的发展模式，斯拉夫派要维系斯拉夫民族的根基。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根基论的理想能够成为协调民主派和自由派、西方派和斯拉夫派的基础。

在《时代》上刊出的文论作品，篇幅最大也最为重要的，是《俄国文学论丛》（1861 年）。这里鲜明地阐发了作家在 19 世纪 60 年代初期的社会立场和文学立场。文章字里行间透露着对他俄罗斯人民和俄罗斯文学的挚爱，表现出他对俄罗斯未来充满信心。围绕普希金作品的人民性与大众对文学读物的需求，陀思妥耶夫斯基深刻阐述了文学与人民的关系，和人民性的本质所在。

《——波夫先生与艺术问题》一文提出的是另一个至关重要的观点——如何看待文学艺术的功能。争论先是在“纯艺术”派和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杜勃罗留波夫之间展开的。杜勃罗留波夫同车尔尼雪夫斯基一样，在当时严厉批评了“为艺术而艺术”的思想倾向。陀思妥耶夫斯基赞同他们的这种立场，对他们一系列的深刻见解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但同时他又认为杜勃罗留波夫对艺术使命的看法，有狭隘的功利主义之嫌，这是他撰文的主旨。早在 40 年代，对文学艺术的使命见解不同，

就是他与别林斯基失和的一个原因。别林斯基要求文学自觉地服务于特定的政治倾向，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这是给文学派定了一种有局限的有损其价值的任务。后来当彼得拉舍夫斯基强调作家的社会使命时，他同样坚持自己原来的立场。据他看来，艺术从来都是现代的，也是现实的，而不是相反，主要的是它不可能不如此；不过，人类发展的历史道路，以及艺术作用于人类的方式，是不可能事先规定的，是极其复杂的，以致批评家很难断定什么有害什么有益。因此他认为，批评家对艺术不该提出任何政治的要求。他认为艺术所表现的，是人类精神对美的永恒性需求，所以无法在艺术中明确划分有益和无益、进步和落后的界限。据此，他维护了阿·迈科夫和谢尔比纳的诗作，而不同意他所认为的杜勃罗留波夫的功利主义立场。另一方面又不同意杜勃罗留波夫给女作家马尔科·沃夫乔克小说的高度肯定的评价，认为他只重视倾向不顾艺术，而在艺术中应该摆在首位的恰是艺术性。尼·乌斯宾斯基的小说集出版后，车尔尼雪夫斯基将它视为民主主义文学反映民众生活的创新之举，预示着文学的新嬗变。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样赞誉了小说的成功，但不认为尼·乌斯宾斯基是开风气之先，因为此前已有作家表现出了上层社会对民众的新见解。在对人民的理解上，陀思妥耶夫斯基更加看重民众的宽厚精神，否认其存在落后保守的一面，否认其缺乏政治觉悟。这些都反映了斯拉夫主义的立场。由于观点的分歧，他指责杜勃罗留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热衷于抽象的论辩，揶揄地称革命民主派是理论家。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论中，与民主派的争论从 19 世纪 60 年代初起一直不断，而且愈演愈烈。1863—1864 年间一场旷日持久的笔战更深入到美学的层次。参战者一方是《现代

人》的编者谢德林和阿·马·安东诺维奇，另一方是《时代》、《时世》的编者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尼·斯特拉霍夫。谢德林嘲笑《时代》编者企图超脱于进步与反动两阵营的斗争之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回敬谢德林说，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理论实际上是取消美学而鼓吹简单的复制现实。这一切使得两刊物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

但由于《时世》被迫停刊，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转入小说的创作，他的文学批评活动中止了数年。在 60 年代下半期和 70 年代初期，作家只是在书信中发表过一些文学评论方面的意见，大多也是针对民主派文论和创作的，明显带有论战性质，还不时流露出个人的激愤。1873—1874 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公民周刊》任主编时，重又写过一些评论文章，在该刊的《作家日记》栏目中发表。他离开《公民周刊》后，在 1876—1881 年，他自己以独立的刊物形式出版《作家日记》，专门发表他个人的著作，其中有少许文学作品，大多是政论时评，却很少文论（这是他自己声明过的），但这为数无多的文论也反映了作家晚期的一些文艺思想。尤其是 1880 年纪念普希金的著名演说，更显重要，因为它可以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文艺观的最后总结。

综上所述，本《文论》卷只收入了 1865 年上半年以前的文章，并非作家文论建树的全貌（因为《全集》中《作家日记》是单独出版的）。单只说这一阶段的文章，其内容也远非上文着重说明的文坛论争所能涵盖的。如果再把《作家日记》和《书信集》加进来整体地看，他一生对文艺问题的思考和见解，是相当丰富而又富于创意的。他继承和发扬了普希金、果

戈理的现实主义传统，对现实主义小说艺术做出了多方面的创新，有时提升到理论上给予独到的阐发。例如他指出文学的深刻全在于典型与性格，写典型的现实也写形成中的现实，开发源自现实的创造性想象，作家对艺术现实持有自觉而明确的态度，借重奇险也要发掘平淡，最高的现实主义在于深刻揭示人的内心世界，如此等等。对当时俄国的重要作家与作品，他有某些独具慧眼的分析评论，例如对别林斯基的回忆，对尼·谢·列斯科夫小说的分析，对列宾画作的阐释，与作家兼评论家瓦·格·阿夫谢延科的争论等等。更不用说他有关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托尔斯泰等大艺术家的论述，虽未必全都公允、中肯，却也能发人深思。对西欧文学的介绍、评论、接受，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文论的一个重要部分。他熟悉和喜爱的经典作家包括荷马、塞万提斯、莎士比亚、高乃依和拉辛、孟德斯鸠和勒萨日、斯威夫特和伏尔泰、莫里哀和博马舍、歌德、席勒、司各特、霍夫曼、拜伦、海涅、密茨凯维奇、巴尔扎克、雨果、乔治·桑、欧仁·苏、爱伦·坡。无论其中的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作家，不少作品得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关注和分析。而透过文学的接受，他对西欧社会和西欧文化，有时做出了深刻的观察和独到的评论。可以说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恰好充分地印证了他自己的一个论断：别国人民的伟大诗人和思想家除了在自己国土之外，最易被理解接受和最令人感到亲切的就是在俄国。作家在这方面留下来的文字，也是研究俄国同西欧文学交往的可贵资料。

在《文论》卷的附录中，收进了有关彼得拉舍夫斯基案件的材料，对了解作家生平和思想发展均十分重要。同时也收入了一些文档中未曾发表和不供发表的旧稿片断（包括少许诗歌

习作)，聊供参考。

毫无疑问，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论作品正如他的小说创作，也是一份颇有意义的思想遗产，对研究作家的创作及其文艺观以至社会政治观点，极有价值。而且它们也是俄国文化史和思想史上的重要现象，对了解和思考今日俄国也不无启示的作用。

《文论》卷据列宁格勒科学出版社 1978—1980 年出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 18、19、20 卷译出。翻译的分工是：苗澍——《〈时代〉杂志 1861 年征订启事》、《俄国文学论丛 引言》和《附录》。柳若梅——由《文学界的歇斯底里》至《俄国文学论丛 关于大学问题》。何芳——由《谢德林先生，或虚无主义者的分裂》至《阿·安·戈洛瓦切夫论古典教育一文读后感》。白春仁翻译其余全部文章，并对全卷译文进行了校对通读，撰写了译序、题解和部分注释。陈燊先生在审校过程中又增补了大量注释，对理解作品大有助益。对上述诸位的支持和协助，谨致谢忱。

白春仁

2005 年 12 月于北京

目 录

译序	(1)
一八四五	
龇牙一笑	(3)
一八四七	
彼得堡纪事	(13)
[4月27日]	(13)
[5月11日]	(24)
[6月1日]	(31)
[6月15日]	(40)
一八六〇	
《时代》杂志 1861 年征订启事	(51)
一八六一	
俄国文学论丛	(61)
一 引言	(61)

二 —— 波夫先生与艺术问题	(105)
摘录与批语	(154)
谢梅夫斯基评乌斯特里亚洛夫著《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皇子》一文(《俄国言论》,1860年,第1期) 的批语	(155)
俄国文学论丛	(160)
三 读书与识字 第一篇	(160)
四 读书与识字 第二篇	(183)
五 晚近的文学现象。《日报》	(231)
彼得堡的诗与散文之梦	(246)
刊出《扎克·卡扎诺瓦在威尼斯(铅顶)监狱囚禁和 越狱奇迹》(回忆录片断)的前言	(279)
刊出《爱伦·坡的三篇小说》的前言	(281)
《拉萨涅尔案件》一文附识	(284)
尼·尼·斯特拉霍夫《席勒小议》一文附识	(285)
诚恳的典范	(286)
“口哨”与《俄国导报》	(308)
《Л. К. 自瓦西里岛致〈时代〉编辑部的信》附识	(326)
答《俄国导报》	(329)
在尼·尼·斯特拉霍夫《争论小议》一文中加入的话	(360)
文学界的歇斯底里	(361)
《时代》杂志 1862 年征订启事	(372)
美术学院 1860—1861 年画展	(378)
有感于《俄国导报》一则哀伤的短评	(404)
尼·瓦·乌斯宾斯基先生短篇小说集	(418)
俄国文学论丛	(430)
关于大学问题	(430)